

盲人女教授的明亮世界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是在超越别人；29岁之后，超越自我。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界；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 ——杨佳

做报告、演讲时，杨佳常以这样一句话开头：“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大家。”她大多时候用中文说，有的时候会用到英文。

如果她不这么提示，坐在台下的听众，很难发现这个戴着无边框眼镜、眼角弯弯的女性，是位盲人。

台下的听众，两个多月前，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师生。彼时，从这个学院毕业10年的杨佳，回去领取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11年度校友成就奖。

杨佳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一人。另一位曾获此奖的中国人，是香港现任特首曾荫权。

连续几个月来，杨佳被当做自强不息的楷模，在全国做巡回报告。

许多学生看了报纸才知道老师是位盲人

今年48岁的杨佳，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教授，教授研究生英语和《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等课程。她也是我国高等学府任职的第一位盲人教授。

面对她的学生，她不仅不会做这样的提示，还会用尽各种努力，来化解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差距。

杨佳右手写漂亮板书时，左手紧贴黑板在悄悄丈量尺寸；多媒体教学操作台上，一块块胶布被她贴在触摸屏上，作为记号方便操作；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她总是尽量多提问，只是想默默记住学生们的声音，以后的课堂上，仅凭声音她就可以叫出学生的名字，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她眉目弯弯的微笑和温和的“眼神”已经到达……

许多学生看了报纸才知道，老师是一位盲人，再次面对她的时候，不少学生潸然泪下……

24岁成了中科院研究生院最年轻的讲师

杨佳并非刚出生就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相反，她人生的前29年，就像她家乡长沙岳麓山上的杜鹃

花，推窗可见，满眼明艳。

15岁那年，还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一的杨佳，在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没想到一举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

年纪最小的她，和许多与她父亲年龄相仿的同学，在竞争中学习。四年后，她以毕业论文满分的优异成绩留校任教，19岁，就站在了大学二年级的讲台上，学生们的年纪跟她差不多。

工作三年后，她考入了中科院研究生院，24岁，就成了那里最年轻的讲师。这回，她的学生，变成了硕士、博士。“一路走来，阳光灿烂”，这个总与优秀挂钩的女子，这样总结自己前半段的人生。

29岁那年起眼睛里再没看见亮光

杨佳没想过的是，“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1992年，她确诊患有由一种罕见的黄斑变性导致的视神经萎缩。从一开始看错行，到字迹越来越模糊，视力，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慢慢消失。杨佳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合拢。

而对这个过程，她无能为力。西医、中医、针灸，甚至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她都尝试过了，奇迹并没有发生。终于，那一天到了，早晨睁开眼，她的眼睛里再没看见亮光。那一年，她29岁。

命运的残酷不止于此。当杨佳沉浸在失明的痛苦中时，她收到了法院寄来的一纸通知。她深爱着的丈夫，认为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长大，向法院正式提出离婚。在那样的年代，残疾的杨佳，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丈夫带着女儿离开，从此消失在她的世界里，直至现在。

接受杨澜的《天下女人》访问时，全程端坐着回答问题的杨佳，在提起这段经历时，不经意地叹了口气。

失明不是句号，只是一个逗号

幸福的叠加不过锦上添花，不

幸接连而来，却足以摧毁一个人。那个在同事、学生眼里，蹦蹦跳跳、乐呵呵的杨佳，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不愿再见人。

终日闭门在家，她又多次被半开的门、抽屉，撞得头破血流，一迈腿踢倒了热水瓶，一抬手打碎了茶杯。为了适应她，父母把原来放在屋子里的家具，全都靠了边。

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她想到了了研究生时期的导师李佩。李老师的丈夫郭永怀先生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为建设新中国举家回国，在参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过程中献出了生命。他们唯一的女儿，也因病去世。但李老师却从没放弃过教学。

老师的力量，让杨佳决定面对现实，从头再来。

所有的生活，从原点开始。身高一米七二的杨佳，重新像孩子一样，学着在黑暗中吃饭、穿衣、走路。

曾有一个记者，试着用丝巾蒙住自己的眼睛，在北京的繁华大街上，在黑暗的恐惧中，她走了38步。

付出了可以想见的艰苦努力，杨佳的生活，仅仅在失明的29岁打了个逗号，而不是一个句号。

重新回到讲台，杨佳在第二年评上了副教授，接着，利用新的电脑语音软件，编写出版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等几本著作，还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开设二十多门英语课程……

哈佛建校以来首获MPA学位的外国盲学生

事实上，媒体的目光，并不是第一次聚焦杨佳。

上一次，人们发现杨佳，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那时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科学时报》集中地报道了她的故事。她也作为残疾人自强不息的代表，作过多场事迹报告会。

那时多数的新闻由头是，这个失明已经8年、37岁的女性，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正准备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从老师变成学生，身份的置换意味着她能主动掌控的东西变少了。

上课，真正变成了听课，靠着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键盘，她把老师

的讲课全部记录下来。

课后，为了完成每天500页的阅读量，她把书扫描进电脑，再用软件读出来，别人看书的时间，她都花在了准备上。

为了赶进度，她听书的速度，达到了每分钟400个英语单词，“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就这样，她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三门课。

她的毕业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征服了曾效力于四位美国总统的顶尖教授大卫·戈根，在戈根的最后一堂课上，他请杨佳总结发言，还赠书题词：Jia, you taught us more. (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 还破例为她打出了哈佛的最高分“A+”，此前，论文的最高分是“A”。

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每个学子匆匆领完毕业证书就离开了。轮到杨佳时，这个典礼因为掌声中断了好几分钟，掌声从前排的师生传到后排的家属，像潮水一样感染了全场几千人。

这掌声，是送给这位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

10年后肯尼迪政府学院校友成就奖授予她

10年过去，还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再次唤起了媒体对杨佳的关注。

今年5月14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将校友成就奖授予杨佳。120个候选人中，评委选中了她，“作为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杰出女性代表，杨佳长期从事保障残疾人权利和权益的工作。”“为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和人权作出了杰出贡献，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

2007年-2008年，杨佳担任北京奥组委志愿者工作专家，为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提供了十多场培训，并创建了志愿者对外交流的“NP3S”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

被誉为中国的软实力

2008年，她第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是唯一一位盲女委员），提交的建议《怎样做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被有关方面采纳。

2008年，杨佳成功竞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委员。

第二年，她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副主席，还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誉为“中国的软实力”，并在2010年年度选举中再次连任，成为四位官员中唯一的连任者。

同一年，她意识到科技可以更好地帮助残疾人实现“平等·参与·共享”，建议创办“科技助残全球化研究中心”。

哈佛肯尼迪的颁奖词中就提到，杨佳帮助成立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并传到互联网为全国乃至全球残疾人搭建一个服务性网络平台作出了巨大贡献。

父亲的眼睛就是她的眼睛

越来越宽广的舞台，让杨佳觉得，抛开眼睛的问题，她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但眼睛的残疾，是她无法抛开的。幸好，她拥有的是另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每天早晨6点，带着她乘公交、倒地铁赶路，2个小时后，准时出现在教室里，待到她下课，代替她目送学生们一一离去，再领她返家。

这双眼睛来自她的父亲，今年年近八十岁的杨中信老人，原中南大学教师。得知女儿失明的消息，这位父亲一夜白头，在女儿决定从头来过的时候，他说：“以后爸爸给你当拐杖”。

19年来，6000多个日日夜夜，父亲的手，成了杨佳的拐杖，父亲的眼睛成了她的眼睛。所以，当哈佛毕业典礼上，如潮的掌声响起，站在后排家属区的父亲，眼里涌出了晶莹的泪。

他坚强乐观的女儿又回来了。

老父亲说，只要他还走得动，就可以带她去她想去的地方。他放心不下的是，以后有那么一天，他再也走不动了。“我现在就希望，杨佳今后能找着她的另一半就好。”

在父亲眼里，黑暗或明亮的转换并不重要，女儿，还是那个女儿。

2011年度哈佛杰出校友颁奖礼上，杨佳以美国著名民主诗人华尔脱·惠特曼的《大陆之歌》（英文片段）结束致辞。真诚希望，接下来的几个19年里，她的生活有人同行，有爱相伴！

据《都市快报》

4岁遭遗弃 女子22年坚持寻亲

4岁时，她被亲生父亲丢在了云南，每天她都会跑到村口的马路上盼父亲来接她，盼啊盼，这一盼就是22年，不知泪水打湿了多少个枕头。如今她结婚生子了，但仍然止不住地想念亲生父母，在听说自己可能是重庆市杨家坪人时，她随即打包衣服，只身来渝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8月4日，回忆起儿时妈妈教的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杨晓娇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我不怪他们丢下我，我只是忍不住想他们，想对他们尽一份孝心……”

思念 耳边不断传来回家声音

杨晓娇，今年26岁，目前为云南当地一家幼儿园的老师。22年前，她被亲生父亲丢在了云南，从此成了别人的养女。23岁时，杨晓娇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结了婚并生下一子。“生孩子时，我才体验到一名母亲的艰辛，这时我更加想念我的父母。”杨晓娇说，坐月子时，养母很少关心她和儿子。杨晓娇发觉，一家三口虽很幸福，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份亲情。今年7月，她无意间看到电视里的一个寻亲节目，通过电话她联系到“宝贝回家”的重庆志愿者。通过杨晓娇提供的信息，志愿者分析她的家很可能在杨家坪动物园附近。

“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买火车票来到重庆。”杨晓娇说，她的丈夫也非常支持她。7月28日，

她安顿好家中事务来到了重庆，一下火车就直奔杨家坪。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她走遍了杨家坪西郊村的每一个社区居委会，并张贴了寻人启事，随后他们还在当地民政局、档案馆等查找，可没有结果。

8月4日，“宝贝回家”的志愿者黎女士称，虽然结果不理想，但他们也将继续帮杨晓娇寻找亲人。前天，3名志愿者又带着杨晓娇到杨家坪派出所抽血，将她的血存放到公安局专门的打拐血库中，试图通过此种方式寻找亲人。

记忆 父亲的外号叫“挣钱狗”

4日上午，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记者见到了在雨中打着伞瘦小的杨晓娇，她下午就要踏上回云南的列车，虽然在重庆呆了一周，四处寻找父母未果，但她仍然不愿意放弃。“我先坐到昆明，然后再

乘车去玉溪市，”22年前她被父亲丢在那里，她要去那里继续寻找线索。

“爸爸有个外号叫挣钱狗，1963年出生，属兔。”杨晓娇拿出了身份证件，她说她实际的年龄要比身份证件上小2岁，是1985年出生在重庆。在杨晓娇记忆里，她已经不太记得爸爸的名字，但那个外号在记忆最深处，一直没有忘记，“可能爸爸叫郑前（谐音），妈妈叫魏书琴（谐音），我叫郑晶晶（谐音）”杨晓娇在使劲地回忆，竭尽全力搜索记忆，尽量想挖出自己知道的一切，“我家是平房，门前有棵大树，附近常常放《一剪梅》这首歌。”杨晓娇擦着眼泪说，父亲小分头，八字胡，肚子或背上又有刀疤，而母亲是卷发，总是骑自行车带她去附近逛公园、看马戏。

甜蜜 爸妈都曾对她疼爱有加

“爸爸和妈妈关系不好，但他们都对我疼爱有加。”杨晓娇称，她小时候父母没有住在一起，她跟着父亲一起生活。杨晓娇回忆说，4岁那年，10月份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父亲就穿上西装收拾好行李，带着她到了火车站，当天母亲和两个亲戚也到火车站送他们。随

后，杨晓娇跟随父亲到了云南玉溪市。“下车后，天气凉，爸爸还给我买了一件运动衫。”杨晓娇称，父亲很疼爱她，还带她去喝咖啡。在她印象中父亲随身带了一些钱，准备做生意。

一天晚上，父亲带着她在一家餐馆吃饭，餐馆里电视放着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4岁的杨晓娇想着好几天没见到妈妈了，就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一个给餐馆送酒的男子走过来搭讪，父亲和男子谈得很投机，两人成了好友，而这个男子就是她后来的养父杨恩权。

经历 突如其来遗弃命运

“你爸爸回重庆了，过几天再回来。”有一天，杨晓娇在杨恩权家玩耍的时候，养父告诉她，生父做生意钱不够，回重庆拿钱去了。一个星期之后，养父就将她带回了老家云南墨江县文武乡老耿寨，让他的母亲抚养杨晓娇，而养父却很少回家。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杨晓娇很不习惯，只上了小学一年级就辍学了。可她常教村里小朋友唱歌，特别是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每唱一次，她都暗暗地掉泪。她想家，每天她都在村里的马路上去盼望，盼望着父亲会突然出现。

下田、放牛、割草……年复一年，她也渐渐长大。18岁那年，她离开了寨子，到了西双版纳打工。

“虽然一个月只有300元，但我要存钱，我想回家（重庆）。”杨晓娇说，她在一家餐馆打工包吃住，一年省吃俭用能存2000多元。可每次她向养父询问身世时，养父都会发火，后来她也就不敢再问了。

心愿 想陪父母一起过日子

回家，寻亲，杨晓娇有一颗急切的心，还有流不完的泪。不过，这些年来，她寻亲的想法被人怀疑。

“很多人问我，来找父母是不是为了要一点抚养费，不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么大了，能养活自己。”讲到这里，杨晓娇非常难过，她说，她目前在云南墨江县文武乡一家幼儿园工作，能养活自己的小孩。

“平时我都非常努力去工作，想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就想找到他们，希望能接他们到云南去生活。”杨晓娇说：“如果他们愿意，我在云南有房子，虽然不大，但可以接他们一起过去住，我只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团聚，我也好尽一份孝心。如果他们有了新的子女，我也会尊重他们的意愿，让他们留在重庆。”

据《重庆商报》